

# 以中文失語症患者為對象的研究考量

高千惠、胡志偉、羅明

吳嫻教授的論文〈從腦傷病人之研究簡介與文材料中的單字處理歷程〉回顧了一個極具影響力的語言之神經機制理論，並在這個架構下討論單字（詞）的處理歷程。誠如吳教授在文中所言，「…儘管功能性腦造影（例：fMRI，PET）、腦磁波儀（MEG）等技術可以讓研究者線上『on-line』立即觀察到受試者的腦血流量和腦波的變化，但這些方法所形成的推論，畢竟只是某認知功能和大腦某區位的相關，不能作為支持兩者因果關係的證據。相形之下，有超過一百年歷史的腦傷病人研究，便提供了瞭解腦結構和認知能力之間關係的另一蹊徑，可彌補其他研究工具的不足…（頁 120）」，所以針對腦傷病人的研究的確可以為研究者提供一扇不同於「常人研究」的窗口，以便他們一窺人類認知系統的本質。尤其，腦傷所造成的失語症常常能夠讓研究者觀察到語言功能的雙向分離現象；這種極具「約束力」的研究結果往往能夠讓研究者較為清楚的判斷語言功能背後的神經機制。然而，在肯定以多元管道進行研究的同時，我們要對以腦傷病人為對象的研究提出一點可能的顧慮，更要對如何進行中文的研究提出我們的呼籲。

使用腦傷病人為對象進行研究的最大爭議是，如何在解剖與臨床上針對不同的症狀進行定義與分類的問題。早在 1908 年，歐洲的神經科學界便在法國展開一場長達數月的失語症辯論大會；其辯論的主題是失語症病人的解剖定位以及臨床症狀。例如，Broca 失語症的病人，其損傷的大腦區域究竟在哪裡？失語症是否應該細分為不同語言成分（如，語言產生、語言理解或是語言構音等）？時至今日，雖然經過將近 100 年的科學研究，但並未減少學界

對失語症的爭議；眾多且歧異的研究資料反而凸顯失語症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Schwartz (1984) 指出失語症病人所顯現出來的症狀是在一個動態系統之下，由許多不同因素共同產生的表象（這些因素包括大腦受損的位置、病人的年紀、病史以及發病的時間等），因此，根據病人的症狀進行分類可能不是那麼絕對，也似乎無法對不同類別的失語症做出絕對清楚的區分與界定。例如，雖然 Broca 病人被歸類為產生型失語症，但有些 Broca 病人同時具有閱讀理解上的困難。因此，Schwartz 指出，失語症病人的病症是多特徵的（polytypic）；亦即，在同一個類別下的失語症病人不會擁有共同的單一的特性，整體來看，他們的症狀會顯現出一群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特徵。同時，任何一個特徵也可同時表徵在多個不同的失語症類別之下。

Caramazza (1984) 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認為失語症病人在認知作業上的不佳表現可能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因為，任何一項認知作業都包含複雜的處理歷程，受試者在作業中的不佳表現可能來自於其中任何一個歷程受到阻斷。例如，研究者藉由唸名作業來觀察失語症病人的音韻表徵是否有障礙；因為唸名作業包含咬音、音段組合以及提取語音等處理階段，因此當失語症病人在這項作業上的表現不佳時，可能只是反映病人在某階段受阻，而不全然是因為音韻表徵有障礙造成的。

上述的討論揭示了失語症（病人）的複雜性，而當我們採用西方科學家在這領域的成果為基礎來研究中文（失語症）時，我們更要留意中文的獨特性。

中文的口語與書寫系統與英文相比至少具有以下的差別：(1) 中文是孤立語，構詞缺乏複雜性，(2) 中文具有單音節的特性，(3) 中文的語句具有主題明顯性的特性，(4) 中文的詞序相較於英文具有多變化，(5) 中文具有豐富的嘆詞與量詞 (Li & Thompson, 1981)。所以當我們運用西方的研究成果與經驗來探討中文時，便有可能會產生一些不適用的情形。例如，在拼音文字的失語症研究中，觀察到非流利型病人的動詞缺失以及流利型病人的名詞缺失現象 (Goodglass, 1976; Zingeser & Berndt, 1988, 1990)，雖然有關中文的相關研究不多，針對這個現象確有歧異的研究發現。例如，Bates 等人 (1991; Chen & Bates, 1998) 也觀察到流利型與非流利型的中文失語症病人會產生動詞與名詞分離的現象，然而，徐雯 (1990) 和吳瑾璋 (1992) 的研究卻並未觀察這兩類的失語症病人有動名詞的選擇性缺失。這些不一致的結果可能隱含兩種可能性。第一，(中文) 失語症的分類可能還未達標準化與一致化。第二，中文的動詞與名詞在詞語結構上的分界可能不是那樣的清楚；而從後者，又延伸出下面兩項考量：(1) 中文使用者對動詞與名詞的表徵問

題：無可置疑的，任何一種語言的使用者對於「動作」及「物件」都有其心理表徵，也可以以語言表達其相對的概念（或理解他人語言），動詞與名詞在中文使用者的知識表徵中的分野是否和英文使用者（或其它語言使用者）一樣則是一個尙待探討的問題。（2）實驗設計的問題：因為動名和名詞在中文中的分別不大，所以如何在實驗中設計出不含其它因素的實驗作業是一個極具挑戰的工作。Hue 和 Tzeng (2000) 甚至指出，一般實驗常用來探討詞彙辨識歷程的「詞彙判斷作業」(lexical decision task) 用在探討中文字彙辨識歷程時，都有「文化適應」的問題；他們認為，中文的研究者應該使用適合中文特性的實驗作業來研究處理中文的認知歷程。

雖然有上述的顧慮，我們更要呼籲學界透入中文的研究；因為，正由於中文具備這些有趣的特性，所以中文研究能夠和以其它語言為對象的研究相互輝映，任這些不同研究的結果產生對照與同理異證的效果，讓我們得以理解「語言」的認知機制。（2006年2月7日收件，第一及第三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第二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